

代序：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

张西平

编者小记：

200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匈牙利汉学界在布达佩斯召开了一个“东欧汉学国际研讨会”，这是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欧洲首次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由于北外是会议主办方，科研处的张朝意处长带队参加了会议，会议受到了教育部社科司领导的重视，张东刚司长等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也受到东欧学者的重视，来自各国的学者在会议上提交了自己的论文。会议后在编辑这个论文集时，考虑到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长期来对东欧汉学的关注，经与北外欧洲语言文化学院的丁超教授等商协，我们也把曾在《欧洲语言文化研究》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一并收入其中，这样，这个论文集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东欧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论文集发表前，需要一篇序言，我找来自己的一篇旧文作为论文集的代序言。所以如此，我感到文章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即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从晚明后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经济的网络之中，中国文化的内核开始在欧洲传播。但目前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化时，绝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仍在中国范围内研究中国文化，没有对文化之间的对比和对文化交流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很难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全球性价值，或者像现在流行的概念：普世性价值。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较早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做了文化与理论的思考，如果将这些思想放在全球文化史中考察，显然是在时间上比较早的，在深度上是有自己独特特点的。但中国文化的特点在别的民族和文化系统是如何被看待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维度，显然在理解中国文化的普世性时是有些困难的。因此，展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史研究是将中国文化史融入世界文化史，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重要学术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东欧

* 本文曾发表于2009年《中国图书评论》第四期。

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在学术界研究得十分薄弱，因此，我们和东欧汉学界的朋友们召开的这个“东欧汉学国际研讨会”就显得十分重要。尽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东欧汉学的历史，但其学术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这样，我就把自己的这篇旧作作为论文集的代序言，以其揭示会议的学术意义。

—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之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会同亚洲各民族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其实，梁公这样的历时性划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从乾隆年间才开始。梁公自己为了说明这一点就提出过两个当时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第一、“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第二、“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他试图通过对这两个在常人看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中国史从来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展开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是相互关联的。因而，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说明：要将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加以考察。

梁启超这样立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时有两个目的：其一，对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不满意，因为在西方主导的世界史中中国对人类史的贡献是看不到的。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他说：“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之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这里他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已经十分清楚。其二，从世界史的

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他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¹虽然当时中国弱积弱贫，但他认为：“中国文明力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²

二

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已经百年，在此以后的历史中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明确提出建立全球世界史的理论，北京大学罗荣渠的现代化历史研究也明确地将世界史的研究和中国史的研究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中外关系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大大丰富了我们关于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关系的认识。武斌先生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就是对中国学术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止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这本著作是值得向学术界推荐的。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总体历史。对中国文化从在海外传播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1949 年以前最著名的代表著作是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以及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等，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方面这三本著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和东亚以及亚洲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成果十分显著，周一良先生的《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严绍璁先生的《日本中国学》都是十分有价值的著作。作为中外文化研究综合性的研究著作，从周一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后较大规模大型学术丛书是 1998 年出版的《中华文化通志》中的中外文化交流系列，这个系列先后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海外华人华侨文化志》等十余卷著作。但

¹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 7 页。

²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2 页。

以上所有这些著作都是从中国和外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文化交流史研究，武斌先生的著作，沿袭了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和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的学术思路，将研究的重点只放在中国文化的外传这一个方面，从而使他的著作有了独特性。平心而论，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的研究在以上提到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作中基本都有所研究和论述，但对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历史做全面综合的研究，这本书做初了自己的贡献。这种综合性研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它跨越了以往的地域性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全球角度来梳理中国文化外传的历史。以往对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的传播大都是从某一个地区和国家来展开研究的。例如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季羨林先生主编的《东学西传丛书》，将注意力放在了欧洲和西方，季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文化集成》大型学术丛书中也包含了多本关于中国文化在东方、特别是亚洲传播历史的研究。武斌的这本书跨越了以往研究的地域性的局限性，将中国文化在东方和西方的传播的历史融为一体，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的综合，这种综合研究的学术价值在于使我们的对中国文化的价值的理解走出了地域的视野，真正开始用一种全球的眼光来思考我们文化的价值。在全球化全面展开的今天，这样的视野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它跨越以往断代史研究的局限性，第一次从历时性的角度全面总结了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与经验。学术界以往对在某个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均有研究，如对唐朝时中国文化在西域的传播，在东亚的传播的研究，又如十八世纪时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都有相当好的学术成果。但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从古代到现代几千年来它在外部世界的传播，从中总结中国文化在外部世界传播的经验和规律，这是首次。历史是真正的教科书，只有在这种大跨度，长时段的研究中，一些历史的真理才会浮现出来。在中国文化重建的今天，这种跨时空的长时段研究对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走出民族虚无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极端的纠缠，建设一种健康的民族文化心态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历史研究应从个案开始，由小见大，只有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才能探索出历史的真实。但史观和史识的研究往往在个案和局部的研究中很难全面展现出

来，没有一定的空间展开，没有一定的时间跨度，真理的普遍性就会受到怀疑。在这个意义上，综合个案研究的成果，从整体上展开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或许这样的综合研究经过一定的历史时间后，随着个案和断代研究的深入，又会显得不足，那就会产生新的综合性研究。学术由此而不断的推进。

第二，初步总结中国文化外传研究的意义。历史不仅仅是怀古之幽情，“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奇的这段话揭示了历史解释的当代意义。正如朱光潜先生在《克罗奇的历史学》论文中所说的“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著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著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作者在书的最后总结了这本书的当代意义。他认为，“中华文化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不仅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也使自己获得了世界性文化的意义，使中华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性文化形态。”³这样在作者看来中华文化不是偏于东亚一隅的地域性文化，不是游离与世界文化大势之外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对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觉，从世界的角度反观自己的文化，走出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绪是很重要的。同时，这个结论也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文化偏见，这对于我们在思想上打破“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持的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模式是有启发意义的。

当前，中国文化处在一个重建和再构的重要历史时刻，一个民族的重新掘起不仅仅在于经济上崛起，从根本上来讲是文化崛起，是民族心理的重构。健康的民族文化心态，首先来自于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不是来自对自己传统的自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自己文化的理性审视。只有站在世界的高度反观自己的文化时，才会有这样一种理性自觉的文化认知。武斌的著作提供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全新的角度。

第三，对中国文化外传的若干重要时段做了较为深入地分析。该书上下几千年，纵横海内外，对于这样以综合性为主题的学术著作，平衡与协调全书的内容，提炼和凝聚主题是主要的，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很难出彩。但这部著作不仅仅照

³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三卷，第2453页。

顾了全局，个别章节写的也相当深入，对中国文化外传的一些问题做了较为深入地思考。

例如在谈到中国文化对十八世纪启蒙文化的影响时，作者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功能作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何以能够在启蒙运动中发挥影响和功能作用？启蒙思想家回应、接受、理解和融合中国恶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文化特征？”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作者认为，启蒙运动是欧洲自身文化和思想变革的运动，他从以基督教神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转向以理性和科学精神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在这样的变革时代，中国文化作为其外部文化为此变革提供了思想的材料和文化的支持。同时，中国作为欧洲的乌托邦理想，催生和加速了欧洲思想的变革，而在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上启蒙思想家们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以中国为自己的文化参照系，创造性的解释中国文化，期间的“误读”、“借取”和“意义的重构”是他们的的基本方法。这样作者运用了自己哲学学术背景对中国文化为何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做了较为全面的说明。

在我看来作者在这里所做的理论分析虽然仍有待深入，但这种分析平实、中肯，是自己思考的结果。这要比那些炒后现代主义的冷饭，满篇新概念的理论可靠的多。对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吸收西方解释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做出独立的思考和理论的构建。

三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代表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学术发展，同时又是至今为止唯一综合性研究中国文化外传历史的著作，从学术上看，虽然近十年学术界在具体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未产生新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为此，武斌这部著作至今在综合性研究上仍保持着领先的地位，仍是一本值得细细阅读的好书。为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我认为学术界应继续关注这个研究领域。我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进一步关注的。

第一，要进一步注重海外汉学史的研究，梳理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具体历史过程。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海外汉学（中国学）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和线索加以展开研究，尽管书中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将中华

文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对象，并精心从事对中华文化的翻译、解释和研究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从中国文化传播到东亚以后就一直存在着，西方汉学的兴起是从晚明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开始的，在此以前的以《马可波罗游记》所代表的西方早期游记汉学。我们所以关心域外汉学（中国学）的原因在于，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化间传播的核心是精神价值的传播，器物的传播相比之下要低一些。而精神价值的传播主要表现为文化间书籍和文献的翻译，从中国文化的的外传来说就是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外传。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外传工作的主要是由各国的汉学家所完成，因此，系统地调查中国典籍的外传和翻译是做好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基础性工作。至今，学术界尚无很好展开这项工作，我手中只有一本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所编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其次，在世界各国从事中华文化研究并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是各国的汉学家，做好重要汉学家的专题研究或者著名汉学家的代表著作的研究，都是亟待展开的工作。虽然，目前出版了一些国别汉学史的著作，但除了严绍璁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和阎国栋的《俄罗斯汉学史》以及严绍璁先生的学术梯队所做的汉学个案研究，例如钱婉约的《内藤湖南研究》外，令人满意并不多。总之，只有抓住了域外汉学（中国学）这个主体，才能真正说清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的历史。域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国语言，目前展开的研究绝大多数仍是东亚汉学（中国学）和欧美汉学（中国学），对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汉学研究基本上没有展开，由此可见，对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历史的研究不过刚刚开始，武斌先生的著作是一本基础性的著作，希望更多年轻的学者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写出更多令人满意的著作。

第二，注重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思想家和文学家中的影响，开辟各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新领域。长期来在对外国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中很少注意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影响，钱钟书先生的《十六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和范存忠先生、陈受颐先生对英国和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都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辟者。上个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早期有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丛书，近期有钱林森先生主编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乐黛云先生主编的《中学西渐丛书》，像孟华的《伏尔太与孔子》、吴泽霖的《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华》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书。

传播和影响是两条线索，传播则重历史与汉学，影响则重文学与思想，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史主要从各国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研究入手，这方面虽然成绩斐然，但仍有极大的学术空间。这一研究领域的展开为从事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揭示全球化历史中的中国影响和贡献。全球经济史是展开中华文化在世界传播的一个基础性学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这个方面有所忽略，文化的影响是和经济的发展与实力紧密相连。长期来在世界史的编写中都是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叙述的，对中国在全球经济史中的地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显然和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史中中国在经济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基本历史不相符的。自贡当·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和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版以来，李伯重、王国斌、滨下武志等人的著作开始被学术界重视，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中的地位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经济史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研究将重新反思现有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重新反思现有的世界史的编写。同时，这也必将大大推动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

第四，注重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更新，保持研究中的理论和文化的自觉。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是一个文化间关系的研究，因而比较文化成为它展开研究的基本方法。目前比较流行的是采用后殖民主义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所写的编的著作已经洋洋大观。但我对这样的方法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至少从我目前的阅读来看，这些舶来理论都有着相当的漏洞，智慧和思想也到启发人，其中有些观点也可以吸取，但总感到不完善，无法很好的说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我去年在为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我们不能说西方汉学有着对中国的想象成分和内容，就可以说，“它和中国无关呢？是否就可以说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都是异国的想象？无论是把东方想象成天堂还是把东方想象成地狱，这些都是西方人将东方作为自己的他者而对自身的认识，它和真实的东方没有任何关系呢？难道西方东方学的知识真是没有真假之分，无所谓对错之别？难道西方汉学只是西方人自己的“单相思”？如宋词中所写的“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离肠万种，

奈归云谁寄？”仔细想想，我认为西方的东方学除了有想象的成分以外，也还是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别的。西方的东方学并不象赛义德说的那样简单，它有着多重的维度，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把握。赛义德只是看到了一个维度而已。……后派理论家们一根筋地看待人类文化间的知识，看待西方的东方学，看待西方汉学，他们无法解释在云霭飞渡下的文化群山。近年来跟着赛义德的理论跑，用此来解释西方汉学和西方的中国观的著作也不少，不能说他们洋洋大观的十几卷著作没有真知灼见、思想的火花，语言的机智在这些学者的书中也都有。但总体上缺乏理论的创造和文化的自觉，他们解释西方东方学与汉学的整体框架和理论是赛义德的，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⁴

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说明，在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的研究中，理论框架和分析的依据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面对就是一堆史料，全部的研究就失去了灵魂。由此，我深感在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真正的在立足本土，吸收外来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理论的创造的并不多。西方理论界的确有好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如何学习，如何吸收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跟着西方的理论跑的太久了。“你唱罢了，我等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些眼花缭乱的西方理论有些使我们理论疲劳，或许回到本土，才能消化好这些“洋货”。这正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望尽乡。”

⁴ 张西平：《萨义德的〈东方学〉与西方汉学》，载《读书》，2008年9期。

东欧与中国：文学、语言学交流

东欧的意义和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影响

宋炳辉

一、从政治东欧到文学东欧

“东欧”作为一个国际区域划分概念，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它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地理概念。表面看来，东欧是一个具有地域意义的称谓，但实际上又对其地理内涵进行了明显的修正，比如前苏联的东欧部分显然不曾包括在内，相反，习惯上又将巴尔干中南部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纳入其中，从而体现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诸国并称的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叙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更加凸显了“东欧”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政治概念上的“东欧”，包括了地理位置上的中欧三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四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情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德意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从这个概念中分离出去（1990 年 10 月东西德合并）；其次，捷克与斯洛伐克各自独立（1992 年 7 月）；第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分解成若干个民族国家，包括先后分离并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科索沃（1991）；最后，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延续了近 80 年的国家名词也变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2003）。那么，“东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政治概念，在上述 7 国（加上历史上的民主德国）已经分化（或归并）为 13 个主权国家以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呢？特别是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归并处理方式还有没有理由和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英美政治学者对“东欧”这个概念及其所指有过不少相关论述。英国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Ben Fowkes）在十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不再被人使用，代替它的可能是‘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

语。”⁵的确，以西欧强势国家的眼光看来，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统一的国际形象，因为它在历史上“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国际间或全世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民族特性。这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只有匈牙利和波兰除外”⁶。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东欧诸国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区在近现代的政治版图始终变化不定的特点，本身就是东欧诸国在历史演变中所体现出来的共同特性。在这一点上，还是那位本·福凯斯的话或许有其道理，他紧接着上述那句话之后又说道，“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欧’这一术语是不可缺少的”⁷，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东欧地区在近代之后虽然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到历史文化遗产，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从地理位置看，东欧诸国地域相邻，位于欧洲大陆的中东部，地处贯通欧亚的咽喉要道，又夹在俄、德、法、意等几个大国之间，因此从地缘政治考虑，它们在历史上既是诸大国相互争夺、企图占领或者控制的地区，也是国际势力争取并加以同化的对象，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分别受到来自西欧和俄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而这些不同的外来文化因素，既互相排斥，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当西欧诸国在16—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东欧诸国几乎都处于被占领的屈辱地位，尽管到19世纪中叶它们先后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民族自主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欧国家相比，其现代化的外激性、滞后性和非自主性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相似的国际境遇，相近民族历史记忆。仅20世纪的一百年里，这一片土地就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一次次激荡和冲击。20世纪初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及苏维埃运动，波及了此地并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中，这里的民族无一幸免，成为法西斯德国占领并残杀的对象，并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北约”、“华约”两大国际阵营的长期对峙中，

⁵[英]本·福凯斯著，张金鉴译，《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Ben Fowkes: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2页。

⁶[美]特里萨·拉克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林穗芳译，《东欧共产主义》(*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edited by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⁷《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第1-2页。

东欧诸国作为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地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交界地带，同样也付出重大的历史代价。战后初期，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领导人，结合各自特点，对社会主义发展做出的不同探索，在斯大林的东欧政策和华沙条约的推动下几乎全部夭折⁸。总而言之，正因为他们大都反复遭受强国的侵略和压制甚至瓜分，并始终难以摆脱作为周边列强争夺对象的处境，因此，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反对外部势力的各种占领与同化企图，争取和保卫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努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长期以来，在种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牵制下，这种努力常常难以成为现实，但这仍然——是这些国家所共有的民族性格。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大国苏联的解体，东欧地区的历史似乎开始了新的一页，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华沙条约国纷纷进行体制改革，由原来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民主选举的议会制度，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加入欧盟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先后完成了所谓“回归欧洲”的转型，但从这种纷纷然的举动中，我们似乎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处境、利益、选择上的共同之处。

从文化角度看，东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民族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明显的相近特征。一方面，东西方宗教文化在这个地区同时具有较大影响，基督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东欧地区同时拥有各自的信众，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受西欧拉丁文化影响较深，居民大多信奉基督教；保加利亚多数居民受东正教影响；阿尔巴尼亚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而罗马尼亚则既有基督教徒，也有东正教徒；南斯拉夫（指前南地区）更是由多民族组成，三种宗教同时存在。这种多种信仰并存的格局，使这地区的宗教文化在差异中显现了一种多元混成的特点。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欧诸国都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机缘，分别受到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及亚洲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尽管都有被外族占领或奴役、控制的历史，但自近代以来，她们始终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保持了语言与文字的民族独立性，发展了各自的民

⁸ 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Dimitrov Mausoteum, 1882-1949）首创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制度”，它在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多种所有制混合并存。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Gomulka, 1905-1982）、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捷共总书记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 1896-1953）等均先后各自进行了制度探索。但 1948 年“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动情报局”的成立成为当代东欧历史的转折，除南斯拉夫与苏联公开冲突外，其余七国全部纳入华沙条约体系，无条件地成为冷战对立阵营一方的组成部分。

族文化传统，在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学创造中积累了深厚丰富的成果。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后，更是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文学成就，为世界文学创造出许多杰出的作品。100 多年来，东欧地区已经有 7 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波兰 4 人：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1905 年获奖）、莱蒙特（Wyadyslaw Reymont, 1868-1925, 1924 年获奖）、米沃什（Czeslaw Mifosz, 1911-2004, 1980 年获奖）、西姆博尔斯卡（Wislaw Szymborska, 1923- , 1996 获奖），塞尔维亚（属前南地区）1 人：安德里奇（Ivo Andric', 1892-1975, 1961 获奖），捷克 1 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 1901-1986, 1984 获奖），匈牙利 1 人：克尔蒂斯（又译伊姆雷·凯尔泰斯，2002 获奖）。除此之外，在前后两个世纪的文学历史中，还出现了波兰的密支凯维奇（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匈牙利的裴多菲（Peitofi Sander, 1823-1849）、约卡伊·莫尔（Jokai Mor, 1825-1904）和莫尔纳（Molnar Ferenc, 1878-1952）；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Elin Pelin, 1877-1949）、伐佐夫（Ivan vazov, 1850-1921）、卢卡契（Ceorg Lukacs, 1885-1971）；捷克的恰佩克（Karel Capek, 1890-1938）、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和哈维尔（Vaclav Havel, 1936-1996）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地缘政治的相邻、历史经验的相似和文化传统上的亲缘关系，使得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 20 世纪以后的文学，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这些共同的倾向，又都与西欧，特别是东边的大国苏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0 世纪之交，东欧诸国都延续着前两个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余绪。到 20 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传播，紧随西欧和苏俄之后，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反法西斯文学在这里同时兴盛；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东欧诸国一度都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奉为典范，并不同程度地排斥了其他文学流派，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一度受阻。同时，伴随着苏联政局的先后变动，东欧国家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均带来重大影响：1953 年的苏联“解冻”思潮、1956 年的波匈事件、1968 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进入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时期，东欧地区一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替代了俄苏文化和文学思潮长期占主导的影响地位，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新现实

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等等纷沓而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东欧剧变”之后，自 90 年代开始，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东欧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东欧社会进入重大转型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日渐明显，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写作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界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和批判；对其中的许多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定位；对以往湮没无闻的作家作品进行发掘和平反；对“流散”域外的文学大力发掘和彰显；对西欧和北美文学不断加以引进，等等。所有这些，成为东欧近 20 年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共同格局。

当然，文学是一种多元繁复的文化存在，即便是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不应该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加以概括，更何况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更何况是如东欧地区这样包括了多个民族的文学，何以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概念和方式去概括呢？这种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意义？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其合理性。将“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加以探讨，的确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体现其理论意义的。但笔者认为，这种有限度的意义，正是在讨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正式居于中国文学主体的立场，探讨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时，或者是讨论文学东欧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问题时，才体现其特殊的价值。进一步说，对于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其实蕴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承认一个民族主体的统一性，也就是将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并且认为它具有某种集体的意识和记忆，集体的文化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这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学特点，探讨国际间民族文学和文化关系的起点。这就意味着，这种讨论暂且搁置了民族整体内部的种种差异，包括阶级、时代、性别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审美态度和文学观念的个体特征，等等因素。而在讨论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问题时，这种相对“统一性”则更显其不可忽略的意义。

二、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接受

在中国现代话语中，将东欧诸国并称的历史并不太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中国现代史中提及“东欧”时，并不意味着更多超出地域之外涵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之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同样是冷战格

局形成之后才从外部（苏联）传入的，但东欧地区的文学在中国体现出它的整体意义，则早在 20 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关于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资料，本人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整理，在参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的研究时，已经基本完成了对 20 世纪上半期的译介情况整理，目前在与丁超教授等合作的“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过程中，对 20 世纪下半期的下半期的整理也基本完成。我的整理工作，主要从文学期刊、主要报纸副刊、作品单行本出版等三个层次，对作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做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当然这份资料肯定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在这里，我只想就 20 世纪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基本特点及其意义做一个概括性论述。

从现有的资料判断，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起始于 20 世纪初叶，要远远滞后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如果与西欧文学相比较，东欧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系统程度上，都有着明显差距。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价值又因其独特性而在现代中国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1906 年，吴棹从日文转译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灯台卒》⁹，可能是最早发表的东欧文学的翻译作品，由此开始了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翻译的历史，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积累，中国读者、学界和文学界对于东欧的了解在整体上也更趋于全面和深入。这近一个世纪的译介历史，大致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期间前后出现了四次译介热潮。即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民国前至 20 年代中期）；30 年代初至抗战初期；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

20 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开始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译介热潮，这就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几乎与吴棹从日文转译显克维奇小说的同时，远在法国的李石曾和远在日本的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在同时关注着东欧文学。鲁迅在著名的《魔罗诗力说》（1907）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李石曾翻译出版了波兰剧作家廖亢夫（L. Kampf, 1881-1913）的剧本《夜未央》（1908）；周作人则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骑士录》（1908），而

⁹ 今译《灯塔看守人》，原署星科伊梯撰，日本田山花袋译，吴棹重译，载《绣像小说》，1906 年第 68—69 期。

兄弟俩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则选译了两位波兰作家的6篇小说。¹⁰在民国之后近40年间,对东欧文学的译介则更加可观。另一位新文学的重要骨干沈雁冰,则在其主持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介绍东欧文学作品,此后包括郑振铎、王鲁彦、李霁野、王统照、韦素园、叶灵凤、巴金、赵景深、楼适夷、曹靖华、施蛰存、杜衡、胡愈之、曾虚白、钟宪民、白莽、徐霞村、孙用、冯雪峰、周立波、周扬、胡绳,黎烈文、焦菊隐、覃子豪、叶君健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了东欧文学的译介,其中以后来被归于左翼作家的居多,他们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受周氏兄弟及茅盾等人的影响,因此倡导者们明确的理论意图显得尤其重要。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一文中的表述是最有代表性的:

[当时]注重的倒是介绍,在翻译……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收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夏目漱石和森欧外。¹¹

不过,在20世纪上半期,译介者们除了直接提及“东欧”文学外,更多地以“弱小民族文学”概念,来谈论和倡导强势民族文学之外的这部分外国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但东欧诸国文学无疑是他们所理解的“弱小民族文学”中的核心部分,因此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意义阐释,同样适用于对东欧文学的理解。鲁迅、周作人和茅盾三位被称为新文学主将的作家,先后对这种译介活动的意义有过明确的表述¹²,而革新版的《小说月报》,正是在周氏兄弟等文学研究会主将的支

¹⁰ 它们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短篇《乐人杨珂》、《天使》、《灯台卒》和《酋长》,和波斯尼亚作家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署名周作人,实为鲁迅、周作人合译。

¹¹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1页。

¹² 鲁迅在《“题未定”草(三)》还说到,“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

持下，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集中译介了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作家作品。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东欧文学译介的第二个热潮。30年代的《文学》和《译文》杂志，前者在1934年推出了“弱小民族文学专号”，¹³其中包括茅盾的题为《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和化鲁的《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等译介文章，并载包括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在内的17个国家26位作家的28篇作品。而后者作为《世界文学》的前身，更是将这一传统¹⁴贯穿至20世纪后半期。

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已经形成一种有意识的传统，而其规模也可以从具体的数字反映出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¹⁵所收录45年间（1915-1949）的276种期刊中，就有74种（26.81%）刊有东欧国家的文学

即易于心心相印……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力眼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余波。”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335-336页。

周作人：“当时我所最为注重的是波兰，其次是匈牙利，因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尤其值得同情”，“中国革命运动正在发达，我们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响，对于所谓被损害与侮辱的国民的文学，更比强国的表示尊重与亲近”。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茅盾在《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一文的《引言》中，申述了“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的理由：“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目前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毫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沙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沈雁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载《小说月报》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期。

“我鉴于世界上许多被损害民族，如犹太如波兰如捷克，虽曾失却政治上的独立，然而一个个都有不朽的人的艺术，使我敢确信中华民族哪怕将来到了财政破产强国共管的厄境，也一定要有，而且必有，不朽的人的艺术！而且小说这‘艺术之花’滋养我再生我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他衰老回到奋发，从灰色转到鲜明，从枯朽里爆出新芽来！在国际——如果将来还有什么‘国际’——抬起头”。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画》，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2期，署名“记者”。

“三四年来，为介绍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之热心所驱迫，专找欧洲小民族的近代作家的短篇小说来翻译。当时的热心，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味”。茅盾：《雪人·自序》（1927年4月作），上海，开明书店，1928年，第2页。

¹³ 《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胡愈之等10人集体编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积极倡导或参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专号”载《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1日出版。

¹⁴ 鲁迅去世后，这一译介传统在第二代作家中得到继续。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次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翻译的《弱国小说名著》，译者中包括王鲁彦、艾芜、施蛰存、卞之琳、赵景深等新文学作家，还有较为职业化的翻译者如孙用、钟宪民等。

¹⁵ 这个统计，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学院的丁超教授做出。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下），徐迺翔主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翻译、介绍或简讯；作品总量为 282 篇，其中匈牙利 111 篇、波兰 66 篇、保加利亚 55 篇、捷克 33 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各 18 篇（包括重译）。而《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1912—1949）》¹⁶中收录东欧文学图书 85 种（包括重译和合集）。由于当时中国掌握东欧国家语言的人数缺乏，以上的译介在翻译途径上，都是借助于日、德、英、法、俄包括世界语等第三种语言转译，在译介方式上改译增删的情况也比较多见。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在民族主权独立之后面临着同样的现代化处境，更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共同性和冷战后国际对立阵营中相同地位（保、罗等国是最先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使中国与东欧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在获得国家层面大力支持，因而使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译介热潮形成明显的特色：一方面，政府力量的推动，不仅大大加强了双方人员来往和信息交流，译介数量剧增，译介范围也拓展到包括电影等新兴艺术；逐渐设置了东欧语言文化专业，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他们便成为中国与东欧文化交往和文学译介的中坚；在译介途径上大多直接从原语直接译入；在译介方式上也与英、法、俄、德等主流语种的中译一样，逐渐建立了一定的翻译规范。同时，这时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也明显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二战题材和农村集体化题材成为两大主要译介内容，尤其是后者，更苏联文学这一共同的影响源有关。

同样由于东欧政治改革等政治意识形态的摩擦乃至冲突以及中国内部的文革运动，东欧文学的译介至六十年代中期后一度几乎中断（除阿尔巴尼亚个别国家外）。直到新时期开始之后，这种译介传统才得以恢复。特别是 80 年代初东欧剧变之后，随着世界历史的演变和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国与东欧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似乎又面临了后冷战时代同样的文化生机和文化困局，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因为这种关联，在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和相互关系上，又在新意义上找到了契合，同样体现了共同的节奏，相似相关的展开方式，从而形成了对东欧文学第四次译介热潮。

立足于中国文学主体立场，围绕东欧文学的意义回顾东欧文学在中国的百年历史。至少可以概括如下几点共识：

（一），相同相似的现代化处境和经验，使东欧文学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

¹⁶ 《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年。

处于欧洲夹缝中的东欧，因为其共同的政治地理位置，对其现代化带来明显的制约：即现代化发生的非自主性；现代化模式选择的限制性和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性。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一度实行的人民民主制度和多党联合执政、多元经济体制，因为冷战对峙的世界格局，而被强制性的苏联模式所替代（高度集中体制，重、轻、农顺序发展国民经济，以及高速度、高积累、好投资的三高方针，农业的强制集体化）。所有这些，都与现代中国在国际外部环境和内部变革方面拥有相似的经历。而作为历史文化映象的文学，现代中国的东欧诸国及其文学，无论是早期的“弱势民族形象”，还是二战和二战以后的“同志加兄弟的形象”，还是 60 年代前后一度演化的所谓“修正主义”的“背叛者形象”，还是东欧剧变之后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他者形象，都是以中国/东欧之间共同的集体经验为前提，并在变化中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也是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得以持续译介并发挥影响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是中国与东欧国家在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以及国际关系历史等基础和上层建筑各层面的异同和相互关联的一种反映和折射，正因为这样，在东欧与中国文学的百年关系中，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各个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约因素。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东欧之间的直接交流和相互关系；二是在各自与其它国际集团或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异同关系，具体的说，就是在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双方在民族关系的各个层面——当然包括文学关系方面与西欧和俄苏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同向、同构及其差异关系。而在这多重关系当中，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可以得到多层次的分析，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意义也可以获得显现。

（三），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接受，是中国主体有意识倡导和实践的结果。它是在民族面临危机的时代，伴随着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并始终伴随着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但它在新文学演进中持续并扩大影响，却是先锋知识分子自发自觉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结果。政治上的重大变迁，意识形态的制约果然影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影响毕竟有限。正是在中国作家、翻译家和研究者有意识的倡导译介之下，东欧文学不仅在整体上作为一种民族文学的价值认同和主体投射，而且使诸如密茨凯维

奇、显克维奇、裴多菲、恰佩克、伏契克、昆德拉、哈维尔等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深入人心。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国家权力因素、甚至语言中介（直接译介还是经第三种语言转译）等，果然影响了中国东欧之间的文学交流的进程，但这些因素对于文学关系而言，并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或充要条件。比如在 20 世纪上半期，国家意识形态的参与（如 30 年代国民政府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弱势民族文学译介¹⁷）非但没有推进包括东欧文学在内的弱势民族文学¹⁸的译介进程，反而引起原先倡导者们的批判和抵制¹⁹；五六十年代国家推动下的译介活动，也并未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多少具有核心创造性的资源；新时期开始的以昆德拉等为标志的译介和借鉴，同样是经先锋知识分子在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积极倡导引进的结果。

（四），东欧文学在中国的意义凸显和接受程度，并不与译介数量的多少对应。文化交往、文学译介与影响接受，并不成正比例的对应关系。相反，接受主体出于主体文化建构和文学创作的需要，进行有意识的译介和评价，才会对本土文学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才会进入本土文化的创生实践，熔铸到民族文学的血液当中。如果把考察对象从译介者、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进一步扩大到文学创作者的层面，也就是说，把民族文学关系的内涵从文本的译介、阅读与感受、研究与认知，进一步扩大到本土文学的资源采用和创造性转化的创作发生层面时（民族文学关系本来应该是包含了这几个层面的多元立体构成），问题就会复杂得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一种外来资源的东欧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深度影响，并不随着对东欧文学译介的数量积累和渐次深入而正比例加重，相反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个人魅力等因素的机缘汇合，东欧文学在中国发挥着特殊而明显的作用，形成中国东欧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正是由于鲁迅等现代作家的有意提倡和明确的意义阐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确定了译介“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基调，沈雁冰借助《小

¹⁷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上海先后出现的 4 种期刊就是中华民国官方意识形态直接干预的产物。《前锋周报》（黎锦轩主编，1930 年 6 月-1931 年 5 月）、《前锋月刊》（朱应鹏、傅彦长编，1930 年 10 月-1931 年 4 月）和《现代文学评论》（李赞华编，1931 年 4 月—1931 年 10 月）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且均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三份刊物不仅在观点上相近，作者成员也有交叉。《矛盾》月刊（1932 年 4 月-1934 年 6 月，共出 16 期，其中 1934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第 3 卷第 3、4 合期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情况稍有不同，刊物及宗旨虽有官方背景，但参与者成份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具体参见宋炳辉：《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载《中国比较文学》2002 年，第 2 期。

¹⁸ 关于“弱势民族文学”概念的论述，参见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第一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2 页。

¹⁹ 矛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载《文学导报》第 1 卷第 4 期，署名石萌。《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1931 年 10 月 23 日），鲁迅：《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11-312、320 页。

说月报》实施并扩大了“弱小民文学”的范围和影响),才使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裴多菲,包括后来的基希、伏契克等先后成为中国新文学外来资源中的一个亮点。正是韩少功(包括之前的李欧梵)等对昆德拉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契合点的敏感,才有了昆德拉在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²⁰。这种对了解—译介—认知与影响—接受两个层面之间的对应和差异意识,包含并预示了中国与东欧文学关系的复杂多元的内涵和阐释空间,而所谓东欧文学对于中国的意义,也只有在这种对应于差异的分析中加以呈现。

总之,对于中国主体而言,“东欧”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认知对象,它是中国现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伴生物,它与中国民族主体意识的生成和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东欧诸国并称,也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指陈行为,同时也表明了中国主体对东欧诸国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处境和民族性格的认知。东欧作为一种镜像,同时也折射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境遇的认识。因为国际关系格局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东欧各国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冷热亲疏、平坦曲折,不仅十分相似,而且往往相互牵连,这种关系状态,同样也反映在中国与东欧诸国的文学关系上。因此,居于中国主体立场讨论中国与东欧诸国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东欧”不仅是对一种客观对象物及其固有联系的认知,在文化价值意义上,更是一种借助他者的镜像对民族主体的自我构成、民族性格的内在特征的审视,是对民族文化的历史境遇和现代进程的反省,进而是对民族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内部特质,包括对汲取外来文学资源、传承与再创民族传统的内涵与方式的辨正与探索。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

²⁰ 宋炳辉:《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接受》,《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218页。